

# 使節、詩人、遷客： 論左秉隆及其《勤勉堂詩鈔》

林立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

## 前言

頻年奔走欲興周，壯志應知老莫酬。  
傲雪誰憐松節勁，拜風都愛柳腰柔。  
未能搖尾終垂尾，但肯低頭即出頭。  
顧我痴頑成痼疾，功名付與水東流。

——〈書懷二首〉之一<sup>1</sup>

這是清朝派駐新加坡的首任正式領事官左秉隆（1850-1924）的作品，當中抒寫了他的抱負以及失望、憤懣之情：他本欲在政壇上有一番作為，卻因為秉性堅剛，不喜逢迎，以致一直沉淪下僚。終其一生，大致可以用使節、詩人、遷客三個身份來形容。使節是他的公職，詩是他公餘的愛好，而遷客則是他一生行跡的概括，亦是他在詩中經常塑造的自我形象。

由於官運不佳，又長期身居海外，左秉隆在中國近代史的名聲並不響亮。但他在早期的南洋華人社會，卻建樹良多，頗有聲望。他曾經倡設義

1 左秉隆，《勤勉堂詩鈔》（新加坡：南洋歷史研究會，1959年），頁173。

塾、開辦文會，又親自評改諸生的課藝，並捐出部份薪俸以勵士子。<sup>2</sup>李鍾珏（1853-1927）的《新加坡風土記》便稱：「近年領事官倡立文社，製藝外兼課策論，稍稍有文風矣。」<sup>3</sup>新華文學的歷史亦由是展開。作為詩人，他存世的詩作達七百多首，其中二百餘首與新加坡或南洋有關。<sup>4</sup>從新馬華文文學研究的角度來看，實有討論的價值。高嘉謙即注意到左秉隆等人的漢詩寫作，是「馬華文學古典時期最早的樣態」，他們「藉由漢詩描述自身流離體驗和異地景觀，深刻紀錄了馬華文學的『南來』起源情境」。<sup>5</sup>從抒情文學的角度而言，左秉隆的作品也頗值得一讀，非止是考究其生平事跡的平板史料而已。「南園今五子」之一的曾希穎（1903-1985），在1956年為

左氏詩集《勤勉堂詩鈔》所作的序中即云：「詩之奇，殆所謂辭不滯意，意能吸新，深入淺出，集元、白、蘇、陸諸家，冶為一爐。自見性情，隨在揮寫。」<sup>6</sup>左秉隆的表甥孫黃蔭普（1900-1986）所撰、附於詩集後的〈記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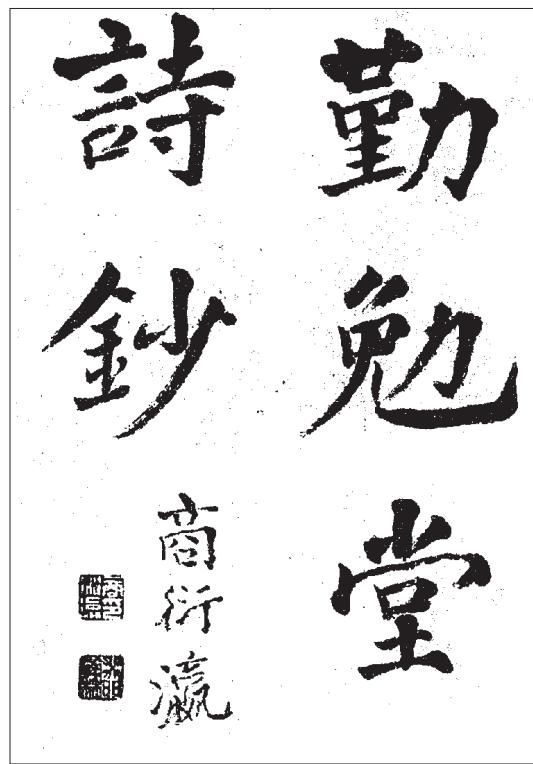


像遺生先興子左

- 2 參閱陳育崧，〈左子興領事對新加坡華僑的貢獻〉，載左秉隆，《勤勉堂詩鈔》，前頁4。
- 3 李鍾珏，《新加坡風土記》（新加坡：南洋編譯所，1947年），頁10b。
- 4 關於左秉隆的南洋詩作數目，李慶年認為有318首，何奕愷認為只有255首。見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98；何奕愷，〈左秉隆《勤勉堂詩鈔》中南洋之作考〉，載《南洋學報》，2009年第63卷，頁132。黃蔭普稱左秉隆的詩作，止截錄到1921至1922年，「所缺尚多，然吉光片羽，亦彌足珍矣。」《勤勉堂詩鈔》，〈記事〉，頁5。
- 5 高嘉謙，〈帝國、斯文、風土：論駐新使節左秉隆、黃遵憲與馬華文學〉（以下簡稱〈論駐新使節左秉隆、黃遵憲與馬華文學〉），載《臺大中文學報》，2010年第32期，頁368。
- 6 《勤勉堂詩鈔》，序頁。

亦稱其「詩格清麗雋潔，尤多新意，雖囿於時代思想及歷史條件，而其憂民傷時之思，振聾發聵之作，有可傳者」。<sup>7</sup>另蔡鈞的《出洋瑣記》記云：「左司馬〔秉隆〕以詠懷詩見示，纏綿跌宕，情韻斐然。司馬既精英文，而漢文又如此超卓，殊令人欽羨無已。」<sup>8</sup>

但左秉隆的詩至今在文學界仍未獲得足夠的注意，而在新馬華文文學的論述中，他的詩名亦總被其繼任者、近代詩壇的明星黃遵憲（1848-1905）蓋過。高嘉謙就如此說：「（左秉隆）詠詩自娛和酬唱作品居多，少有大手筆的長篇和聯章巨構。不像黃遵憲早已揚名晚清詩壇的身份，以史家手筆寫詩。」<sup>9</sup>此話誠然不差，但左秉隆詩作的個體獨特性，亦很容易被類似的優劣評比所淹沒。事實上，高嘉謙並非沒有注意到左秉隆作品的可貴之處，首先是對南洋華人社會的觀感：「如果我們在黃遵憲詩發現的是一頁華人離散史，那麼更早抵新的左秉隆卻以使節個人情懷映襯了另一種的南洋華人面目。先後兩次派駐新加坡的左秉隆，最能看出使節勢力和華人社會之間的微妙改變。」這是因為左秉隆第二次擔任領事時，新加坡的華人社會已分裂成保皇與革命兩派，他身為使節，時刻要站在清廷的立場，與華社的關係自然不若從前融洽。<sup>10</sup>其次，高嘉謙從新馬的風光書寫著眼，認為「相對黃遵憲的風土視野，左秉隆在新加坡多年，作詩不刻意著眼風土，卻足跡遍及馬來半島和印尼，詩題總難免



商衍瀛為《勤勉堂詩鈔》的題簽

7 《勤勉堂詩鈔》，〈紀事〉，頁4-5。

8 蔡鈞，《出洋瑣記》，收入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臺北：廣文書局，1964年，據上海著易堂1897年本影印），頁9前。

9 高嘉謙，〈論駐新使節左秉隆、黃遵憲與馬華文學〉，頁376。

10 同上，頁383。

觸及異地風光。……但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倒是以息力〔筆者按：即新加坡〕為題的詩作，描寫自己派駐十餘年的新加坡小島，反而有一種雅致的清優美感。」另外，高嘉謙亦注意到，雖然貴為使節，左秉隆的飄泊生涯和生活憂患，「實在跟許多南來謀生者無異」。<sup>11</sup>生活上種種的不如意，讓他使節的光環褪色不少，亦加深了他的飄零感。本文意圖從左秉隆的生平行跡入手，展述其詩學理念，探討其不限於南洋的、有關其他地方的作品，藉此盡量還原「詩人」左秉隆的完整性，並看出在時代變易的大潮下，左秉隆如何以詩歌勾勒出一個近世文官遷徙流離的生活經驗和感受。筆者固有意加強左秉隆在近代詩史及新馬華文文學史中的曝光度，但亦不擬刻意抬高左氏的文學地位，其本身有多少份量，則以多少份量秤之是也。

## 第一節 從左秉隆的詩看其生平行跡

左秉隆，字子興，別署「炎洲冷宦」。<sup>12</sup>他的遠祖原籍瀋陽，入清改隸漢軍正黃旗駐防廣州。他不像一般清代的文人那樣由科舉考試得官，而是通過廣州同文館肄業踏入仕途，曾任北京同文館英文兼數學副教習。<sup>13</sup>他的〈我且歌〉是一首記述前半生的詩作，大概寫於第一次在新加坡任職時期，裏面提到他加入同文館的原因和過程（數字為《勤勉堂詩鈔》中頁數，下同）：

是時余年十三四，甚欲學文掇科第。但思身已列戎行，報國  
豈必在文章。清畫與騎射，根本不可忘。朝從仲兄習國語，暮從  
伯父學挽強。十五學得技藝成，方欲登壇角短長。無端世局忽更  
變，中學寢衰西學煽。大開學館曰同文，招考生徒身入選。初習  
方言算術輿地圖，繼讀化學格物公法書。（29-30）

可見他早年繼承祖業，既習文又練武。但後來順應西學東漸的潮流，才加入同文館攻讀。1879年，左秉隆因為精通英文，隨曾紀澤（1839-1890）出使英、法等國，任駐英使署三等繙譯官，曾對其「倚畀甚殷」，而左氏亦以師

11 同上，頁389，383。

12 《勤勉堂詩鈔》，〈記事〉，頁4。

13 〈左子卿先生年譜節錄〉，載《勤勉堂詩鈔》，頁1。

一八九四—一九二〇年代：歷史鉅變中的香港

禮事之。<sup>14</sup>在〈我且歌〉的後半部，左秉隆如此說：

倫敦富厚甲天下，巴黎繁華冠九洲。其間名勝尋難盡，何事最不負此遊。在英曾入石炭洞，在法曾坐輕氣球。炭洞之深深如墜無極，環顧四圍皆墨色。氣球之高高如上青天，下視人寰幾點煙。（31）

詩中概括了他歐遊的經歷，其中石炭洞和輕氣球，給他留下的印象最為深刻。1881年，曾紀澤推薦左出任駐新加坡首位正式領事官，稱其「年力正富，學識俱優，通達和平，有為有守，熟悉英國情形，通曉西洋律例，以之充補新嘉坡領事官實屬人地相宜」。<sup>15</sup>而左氏亦不負所托，在任期間的表現，有口皆碑。

左秉隆前後在新加坡擔任領事官十二年，第一任由1881至1890年，第二任由1907至1910年。關於他在任時的事功，前人多有提及，例如取締販賣豬仔、設保良局保護由香港被拐賣到新加坡的婦女、破獲海盜、創辦同濟醫院贈醫施藥等。<sup>16</sup>至於他在新加坡振興華夏文教一事，更值得大書特書，皆因這些舉措不但提高了當地的華文教育水平、推動華文創作風氣、開通民智，還凝聚了海外僑民的華族集體意識，加強了他們對清廷和中華文化的向心力。而英語雄辯會（celestial Reasoning Association）的設立，則吸納了受英語教育的土生華人和華人上層社會菁英，使他們重新認同自己的華族身份與文化。因此柯木林認為，左秉隆是「新華文化的奠基者」，讓新加坡的化外移民接受「再華化」（Re-sinolisation）的洗禮。<sup>17</sup>而高嘉謙則更精闢地指

14 見朱傑勤，〈左秉隆與曾紀澤〉，載《南洋雜誌》，1947年第1卷第4期，頁75。

15 引自朱傑勤，頁75。此前英國要求清廷只能在新加坡設置臨時領事，而且只可在當地華社中物色人選。為加快設使的計劃，清廷只得遷就英方之意，在1877年委任新加坡僑領胡璇澤（1816-1880）為首任領事，但胡同時亦被俄國和日本委派為駐新領事，身份相當駭異，在任時亦無甚建樹。胡去世後，繼任的蘇淮清在當地華社聲望不高，曾紀澤遂趁機提出正式由清廷委派領事官，不再選用僑領充任。關於清廷在新加坡設使的經過與細節，見蔡佩蓉，《清季駐新加坡領事之探討（1877-1911）》，頁26-40，168-169；另參姚楠，〈中國駐新加坡首任領事胡璇澤的得官原因和政績評價〉，載氏著《南天餘墨》（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119-126；陳育崧，〈新加坡中國領事設置史〉，載氏著《椰蔭館文存》（新加坡：南洋學會，1983年），第一卷，頁113-120。

16 陳育崧，〈左子興領事對新加坡華僑的貢獻〉，頁6-7。黃蔭普，〈記事〉，頁2。

17 柯木林，〈我視新洲成舊洲：左秉隆與新中關係〉（以下簡稱〈左秉隆與新中關係〉），載《南洋學報》，2009年第63卷，頁114。

出，像左秉隆這樣的使節，從事的不僅是外交任務，還負有傳統士大夫的教化使命，意圖藉文教、護僑等工作凝聚華人士階層對清廷的歸屬感。<sup>18</sup>

透過左秉隆的〈為諸生評文有作〉一詩，我們可以看出他對新加坡華族文教事業的熱心：

欲授諸生換骨丹，夜深常對一燈寒。

笑余九載新洲住，不似他官似教官。（243）

「笑余」兩字不無自嘲的況味，畢竟教學和評改諸生的課業，原不在外交官的職責範圍，但是開首的「欲」字卻顯示他確有心提攜後進。<sup>19</sup>〈送學生回國肆業〉一首（172），則提到端方（1861-1911）在南京設置暨南學堂，專門招募海外特別是南洋的僑生歸國讀書，時維1907至1908年間。<sup>20</sup>詩末有句云：「願移桃李栽中土，散作千紅萬紫春」。表達了坡中士子的期盼，希望他們能學有所成，回饋祖國。

左秉隆在新加坡推行的一系列政績，著實為他贏得了不少稱譽。當地士子曾製了一個「海表文宗」的匾額予他，感謝他在文教事業方面的貢獻。另外，英語雄辯會在1889年借光緒大婚慶祝會的機會，向左秉隆獻上頌辭。1891年他第一次離任時，士紳們復為他送上「萬民傘」、「德政碑」。<sup>21</sup>薛福成（1838-1894）、曾紀澤等著名的外交官，均對他讚口不絕。其他如當地報章對他的稱道，亦屢見不鮮。<sup>22</sup>

在僑民眼中，左秉隆固然是值得推戴的使節。但他的個人心境與遭際，卻是另一副面貌。首先新加坡領事一職，對他而言並非優差，他本有更宏大的抱負。田嵩岳的《中外述遊》提到左秉隆，說他「倜儻有大才，居此不得

18 高嘉謙，〈論駐新使節左秉隆、黃遵憲與馬華文學〉，頁363-364，366-367，369-370。

19 此詩被認為是與左秉隆創設的文社「會吟社」有關。會吟社活動的詳細記載，參閱梁元生，〈十九世紀末期新加坡華人社會之士人雅集〉，載氏著《新加坡華人社會史論》（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1997年），頁9-30；另見葉鍾玲，〈左秉隆與會吟社〉，載《中教學報》，2001年第27期，頁115-128。

20 參考柯木林，〈左秉隆與新中關係〉，頁116。

21 陳育崧，〈左子興領事對新加坡華僑的貢獻〉，前頁5、8。

22 同上，前頁7；另見柯木林，〈左秉隆領事與新華社會〉，載氏著，《石叻史記》（新加坡：新加坡青年書局，2007年），頁77。

一八九四—一九二〇年代：歷史鉅變中的香港

展，鬱鬱非其志，故自號為炎洲冷宦。」<sup>23</sup>感受如同遷客的他，一但被調離新加坡，即歡喜若狂，其〈別新嘉坡二首〉之一即說道：

幾度陳情未許歸，今朝喜氣動慈闈。  
魚衝波浪群爭躍，鳥戀山林自退飛。  
海上罷持蘇武節，篋中檢點老萊衣。  
從今且叙天倫樂，世事摶心合漸稀。 (129)

大中原意識以外，詩中還不乏舊體詩慣用的傳統事典和辭句：他的歸國就如留滯匈奴多年的蘇武歸漢一樣。但他萬沒想到，他和新加坡的緣份尚未終了，輾轉十七年後，又回到了這個「蠻荒之地」。他的〈重領新州七律四首〉中的一、二首云：

其一：

十七年前乞退休，豈知今日又回頭。  
人呼舊吏作新吏，我視新州成舊州。  
四海有緣真此地，萬般如夢是茲遊。  
漫云老馬途應識，任重能無顛蹶憂。 (168-169)

其三：

贏得頭銜一字榮（昔為領事今充總領事），翻令心緒萬愁生。  
同來舊館人何在，獨宿空牀夢自驚。…… (169-170)

詩中充滿了牢愁與抑塞之感。左秉隆當時的銜頭，是「駐新嘉坡兼轄海門各處總領事」，較前多了一個「總」字，因而第三首說「贏得頭銜一字榮」。然而他一點不引以為榮，反倒是有種酸溜溜的滋味。一方面領事館已經人面全非，一方面他的妻子亦已亡故（「獨宿空牀夢自驚」）。第一首中的「舊吏」與「新吏」、「新洲」與「舊洲」的對比，頗有一種「似是而非」的自嘲意味，亦很自然地帶出了後面「四海有緣真此地，萬般如夢是茲遊」兩句。這種與新加坡的「緣份」，其實他並不希望去再結一次。而此時清廷的

23 田嵩岳，《中外述遊》，收入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臺北：廣文書局，1964年，據上海著易堂1897年本影印），頁2後。

威信在華人社會已受到動搖，雖然市面商業繁榮，學風已「漸開通」（〈重領新洲七律四首〉之二），但保皇與革命兩派，時相衝突，讓他束手無策。李慶年談論左秉隆的詩時，對他謹慎處事的態度，多有責難，尤其批評他在外交方面缺乏抗爭。<sup>24</sup>其實設身處地，不難想像左秉隆可以做的並不多，特別是在清朝日薄西山的時候：一個末代的領事官，內受同胞抵制，外受英人鄙視，加上對仕途意興闌珊，他的鮮有作為，也就不難理解了。<sup>25</sup>

卸去第一任駐新領事後，左秉隆在官場兜兜轉轉，始終不能扶搖直上。在駐新期間，薛福成曾保奏他「晉道員分省先用，加布政使銜」，後又曾兩度推薦他出任駐香港及仰光的領事官，但都因故未果。<sup>26</sup>此後他曾總辦廣東洋務，及上京任外務部頭等繙譯官兼戶部計學館教習。1906年，清廷派五大臣出國考察，以順應國內要求立憲、推行改革的呼聲。<sup>27</sup>他以頭等參贊的身份隨行遊歷日本、歐美各國，訪問英國時獲牛津大學贈以名譽學士學位。<sup>28</sup>旅途中他寫了不少詩歌記述見聞，除了名勝古蹟，西方社會的政治面貌，亦成為他的寫作題材，如〈英國婦女要求選舉之權〉一首云：

鼓鼙動地旗摩霄，聒耳雌聲恣叫囂。  
共道婦人能議政，不應男子獨登朝。  
空王說法都平等，大律繩民只一條。  
漫誦文明多熱血，可憐冷水向花澆（首相班那曼對眾婦女  
云，爾等熱血可嘉，惜予不能不澆冷水數滴耳）。（166）

24 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頁98-99。柯木林的意見恰好相反，他認為左氏在處理外交事務上「恰如其份，不亢不卑」。見柯木林，〈左秉隆與新中關係〉，頁117。

25 黃蔭普稱左秉隆再任駐新領事時：「清社將屋，民心杌隉。公〔左秉隆〕目覩國政昏憤腐朽，不欲同流合污，履任之後，保僑惠民，雖未稍懈，然已萌退志。」《勤勉堂詩鈔》，〈記事〉，頁4。

26 駐仰光領事一職，他以親老推辭未赴。見〈左子卿先生年譜節錄〉，《勤勉堂詩鈔》，年譜頁2-3；黃蔭普記述左秉隆曾兩次拒絕向執政的親貴行賄，以是無法升遷。見同書黃蔭普〈記事〉，頁3。丁新豹博士嘗向筆者指出，由於左秉隆在新加坡對僑胞的「統戰」工作做得相當成功，英國對此頗為忌諱，因而極力阻撓清廷委派他到香港擔任領事。

27 參閱陳丹，《清末考察政治大臣出洋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陳丹在整本書中，甚少提到左秉隆，只說他「曾隨曾紀澤出洋」（頁367），及擔任英文翻譯（頁219、233）。

28 見〈牛津大學校頒贈學士銜名詩以紀之〉，《勤勉堂詩鈔》，頁165。

一八九四—一九二〇年代：歷史鉅變中的香港

左秉隆對婦女爭取選舉權的態度是頗為曖昧的，一方面說她們在「叫囂」，一方面又似乎同情她們的訴求。不過像這樣關切到西方社會文化的作品，左秉隆在此行寫得並不多，反而〈隨使各國考察政治作二首〉之二，隱約提到五大臣及隨員之間的分歧：

五鳳齊飛百鳥隨（五大臣所帶隨從頗夥），可憐趨向總相歧。  
聞聲我亦耳頻掩，顧影誰能心不疑。  
竹好豈容穿徑入，花深只許隔籬窺。  
閒翻歷史思前事，彼得伊藤實可師（俄皇彼得，日相伊藤，  
均以久居外國，學成而歸，振興其國）。（167）

「趨向相歧」、「聞聲掩耳」、「顧影心疑」都若有所指，而作為隨侍官員，他亦往往無法參與決策（「花深只許隔籬窺」）。即便如此，在詩末，他仍甚為讚賞日、俄（雖然他沒有到過俄國）兩國的立憲制度，認為兩國之所以能夠復興，正是由於執政者曾長期留學國外，思想較為開明之故。

隨使出洋之後，左秉隆便於1907年第二度出任駐新加坡領事，三年任滿即堅請辭職，但仍在新加坡寓居至1916年，原因大抵是由於中國政局動盪，加上他有前清遺民的身份，於是暫且寄身海外，採觀望之策。此時他的生活頗為悠閑，讀書、飲酒、遊歷是這一時期作品的基調。不過他並非完全不問世事，歐戰與中國政局的變遷，在他的詩中仍偶有反映，如〈歐戰〉、〈聞歐洲大戰感而有作〉、〈聞粵東起事感而有作〉、〈聞選定正式總統感而有作〉、〈聞政府屈從日本之所要求感而有作〉等。<sup>29</sup>

1916年，他終於起程歸國，先是徙居香港，住在九龍彌頓道九十二號，同年九月回廣州。<sup>30</sup>在港期間，他最值得注意的活動，便是認識了陳伯陶（1855-1930）等清遺民，有關作品包括〈題祖坡居士宋臺秋唱圖八首〉、

29 《勤勉堂詩鈔》，頁54-55、180、178、179、196。

30 《勤勉堂詩鈔》，黃蔭普，〈記事〉頁4。沒有資料談及左秉隆為何短暫停留香港。他在〈徙居九龍〉一詩寫道：「為避羊城亂，全家徙九龍。……回看桑與梓，妖霧障重重。」（頁89）按1916年3、4月間，革命黨人在廣東發難，攻擊支持袁世凱稱帝的廣東將軍龍濟光，迫使龍宣告獨立。至6月袁病卒，10月龍濟光撤出廣州，禍亂始稍平。左秉隆很可能為此將家人暫時遷到九龍。見《廣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廣州市地方志》（互聯網版），網址：<http://www.gzsdfz.org.cn/dqzlk/>，卷一，〈大事記〉，頁120-125。

〈寄九龍真逸〉等詩（陳伯陶號「九龍真逸」）、〈遊九龍城〉等。<sup>31</sup>宋臺即宋王臺，原址在九龍馬頭角海濱一座小山上，相傳南宋末年為逃避元兵的追擊而流亡到九龍官富場的宋端宗趙昱，與其臣僚曾於此休憩。清亡後陳伯陶等遺民，有意識地重新發掘（或構建）有關史蹟，又向港英政府申請保護遺址，並招引文人登臺雅集唱詠，以寄寓他們的亡國之痛，這些詩作後來收入1917年蘇澤東（1858-1927，號祖坡）等輯錄的《宋臺秋唱》中。<sup>32</sup>左秉隆的〈題祖坡居士宋臺秋唱圖八首〉，懷古傷今，對傾危的國運表示關注，亦略有追念前朝的意味：

其三：「片石摩挲空涕淚，九州瞻眺尚風煙。」  
 其五：「大地於今無淨土，遺民從古老荒村。」  
 其六：「我來無限滄桑感，弔古詩成引恨長。」  
 其七：「悵望千秋同一轍，何堪袖手看殘棋。」

不過左秉隆此後的詩作，並沒有很強烈的遺民意識。他回到廣州後悠游卒歲，作品內容大都是追念平生，或與友朋酬詠。如〈七十自壽詩四首〉之三說：

風霜飽歷尚餘生，投老深思見太平（用放翁句）。  
 恩沐五朝殊未報（自道迄宣），年高三葉竟何成。  
 國中許我今扶杖，海內憑誰早息兵。  
 願借麻姑一杯酒，澆腸酩酊到河清。（208）

雖然仍念念不忘前朝的「皇恩」，但隨即說「國中許我今扶杖」，似乎對自己現下的生活狀況並沒有太大的抱怨，只是不安的局勢仍使他憂心不已。他把所居稱曰「安樂窩」，並題詩一首曰：「天地一窩，我於此託。有禮則安，無欲便樂。」（306）要獲得所謂的「安樂」，前提便是「有禮」和「無欲」：這頗能反映出他告老還鄉後的心態，亦可視為他對自己一生處世為人的總結。在宦海浮沉、飄泊了大半生後，他似乎終於在故土覓得了一個安

31 《勤勉堂詩鈔》，頁197-200、204-205、90。

32 有關陳伯陶等清遺民對宋王臺史蹟重新發掘的過程、目的及《宋臺秋唱》的唱酬意義，詳參高嘉謙，〈刻在石上的遺民史：《宋臺秋唱》與香港遺民地景〉，載《臺大中文學報》2013年6月第41期，頁277-316。

樂窩。

## 第二節 左秉隆的詩學觀與詩藝

沒有論著深入討論過左秉隆的詩學觀與詩藝，學者一向關注的，都是作為清朝使節的左秉隆，其詩反映了怎樣的南洋視角。但要了解「詩人」左秉隆，就不能不談他的詩學。左秉隆雖然不是近代詩壇的大家，但在南洋總算是曾經獨當一面的文壇領袖，對當地的創作風氣想必產生過一定的影響，其詩學趣味，亦與時人有相合之處。故在此稍作分析，庶可填補學界的缺漏。

首先，左秉隆對元稹、白居易最為推賞，他在〈讀書雜詠二首〉之二說：

詩人毀元白，動謂其輕俗。何異彼蜉蝣，公然撼大木。

元白自有真，感深入心目。羊質而虎皮，適形中不足。

天籟本天然，吾愛山僮曲。（25）

元、白「輕俗」的詩風一向被人咎病。但像韓愈維護李白、杜甫一樣，左秉隆認為那些批評者，只如蜉蝣撼大木，不自量力；而元、白詩的可貴，正在於感情真摯，容易引起讀者的共鳴。一味在字句表面下功夫的作品，只會暴露出內容方面的貧瘠（「羊質而虎皮，適形中不足」）。同樣的看法，亦見於〈題談苑白樂天事後〉一詩：

我思感人心，惟有詩最易。讀者倘茫然，語妙竟何濟。

寧笑我無文，不用難深字。欲令老嫗解，遑恤大雅棄。（22）

宋代孔平仲的《談苑》，提到白居易的詩淺白易懂，連老嫗亦能解讀。<sup>33</sup> 左秉隆對此大表贊同，情願被譏訕為「無文」、遭大雅之士所棄亦在所不計。

另外，陶潛亦是左秉隆的學習對象。〈讀陶詩〉、〈自題愛吾齋〉、〈讀陶淵明傳書後〉、〈讀陶淵明歸去來辭書後〉、〈劉少希以陶潛集及杭世駿嶺南集寄贈賦此以謝之〉等篇，都表達了對陶潛的人品和作品的嚮慕。<sup>34</sup> 例如最後一篇開頭即直稱：「我於古詩最愛陶，謂其可以繼風騷。後來作者

33 孔平仲，《孔氏談苑》（臺北：新興書局影印，1978年），卷四，頁2103。

34 《勤勉堂詩鈔》，頁7、9、22-23、26-27、34-35。

多凡響，不為鳥噪即蟲號。」左氏自己比較傾向質直簡樸的詩風，這無疑是受到了陶潛的影響。試看〈首夏散步北郭觀農人分秧〉一詩：

苦雨催春去，還我清和天。久在城市居，對此興悠然。  
策杖出北門，樹杪日初懸。徘徊石路上，瞻彼負郭田。  
田中有農叟，隱隱立蒼煙。手握秧盈把，分插陌與阡。  
涼風一披拂，萬頃翻碧鮮。吾懷豈不暢，顧爾實堪憐。  
豐收未可必，四體勞悴先。望望復行行，歸誦幽風篇。（12）

題材固然與陶潛的田園詩相類，遣辭措意，亦間有陶潛的影子。例如「涼風一披拂，萬頃翻碧鮮」，頗有陶詩「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之意；而末尾的「四體勞悴先」，亦借用了陶潛的「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一句。<sup>35</sup>

左秉隆似乎亦有意仿效王維的詩風。〈和王摩詰七律六首〉（136-139），是他唯一追和前人的作品，當中帶有沖淡和平的氣息和頗濃厚的隱逸思想。除此之外，《勤勉堂詩鈔》中亦有為數不少表現閒適的篇什，例如：

〈山居雜詠六首〉之六：「夜涼還釣月，春暖且耕雲。……閒來石上坐，麋鹿自為群。」（80）

〈閑吟〉：「齋小僅容膝，心閑別有天。……虛窗無夢寐，松月自娟娟。」（80-81）

〈幽居〉：「我愛幽居好，幽居事事幽。……嬾逐塵驅馬，閒看野放牛。」（87）

〈題所居樓〉：「……清宵香自爇，白晝戶常關。試問紅塵客，誰如此老閑。」（89）

〈閒居〉：「靜聽鐘聲敲乙乙，閒看簾影動頻頻。箇中佳趣誰能識，獨有心栖物外人。」（110）

這些詩句裏面都有「閒」（或「閑」）字，而與這種「物外」的生活氛圍相對的，便是「紅塵」：他一直想揚棄的公共空間。像自古以來很多有關隱逸

<sup>35</sup> 陶潛，〈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之二、〈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載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77、84。

一八九四—一九二〇年代：歷史鉅變中的香港

的作品一樣，左秉隆亦在這些詩中，通過描寫不為世塵滋擾的居所（「虛窗」、「幽居」）和悠遊自在的行為（「釣月」、「耕雲」），營構了一個屬於自己的私人生活空間。

要之，左秉隆寫詩強調自然率性，不刻意斧鑿，以下詩句可以為證：

〈自題詩稿〉：「興至漫揮毫，風雨獨來往。」（15）

〈興到〉：「興到即成詩，何須苦構思。寄懷誠不俗，得句自然奇。」（65）

〈興到〉：「我生性本愛山林，興到時時還一吟。人得清閑詩易好，境惟平淡味彌深。」（183）

〈得句〉：「句好每從無意得，文奇最忌有心求。但逢興會恣揮灑，不向巉巒索隱幽。」（190）

看來他比較偏好「無意」得之的作品。他甚至還表示，不想把詩寫得太「離奇」，是為了不讓作品流傳後世。<sup>36</sup>一般詩人都希望能寫出千古傳誦的作品，但他卻反其道而行，確實出人意表。無怪乎高嘉謙說左秉隆「創作的企圖心不大」。<sup>37</sup>總體而言，他不是那種刻意求工的詩人。

左秉隆詩另一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有關新名詞的採用和新事物的描寫。這一點與晚清的「詩界革命」頗為相近。繼左秉隆出任駐新領事的黃遵憲，一向被公認為是這場運動的先驅。左秉隆與黃遵憲在詩學方面，似無甚交流，因此很難說他有否受到黃遵憲的影響。<sup>38</sup>但對於詩歌改革，左氏顯然與「詩界革命」同人不謀而合。他的〈新名詞〉便道：

新理日以開，新思日以發。不有新名詞，焉能意盡達？

老宿拘守舊，誓欲斬藤葛。豈知創造功，未容概抹煞。

我初亦惡之，目釘恨難拔。習久乃相安，喜其簡而括。

36 見〈率成二首〉之一、〈自題詩稿〉，《勤勉堂詩鈔》，頁240、15。

37 高嘉謙，〈論駐新使節左秉隆、黃遵憲與馬華文學〉，頁376。

38 左、黃二人只有過一次贈答。黃遵憲寫有〈寄懷左子興領事〉一詩，左秉隆酬之以〈次勻酬黃公度觀察見寄〉一首（頁129），但兩人都沒有談及詩歌改革。見黃遵憲著、錢仲聯箋注，《人境廬詩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中冊，頁534。左氏另一首提到黃遵憲的作品是〈別新嘉坡二首〉之二（頁130），這首詩只在末句稱讚了黃遵憲在吏治方面的才能，與詩學無關。

誠哉字訓孳，生機不可遏。（13-14）

大意說不採用新名詞，就無法表達日漸湧現的「新理」和「新思」。此外如〈戲作番詩〉、〈飛機〉、〈潛水艇〉、〈飛船〉、〈觀海上試電燈〉；〈詠自來火〉、〈詠自鳴鐘〉、〈到禪山見火輪車〉、〈舟載火車渡河〉等，都是與新事物有關的作品，有些辭意俱新，有些仍不免恪守舊風格而無法涵融新意境。<sup>39</sup>〈潛水艇〉是較為獨特的一首，前半篇寫人類仿效自然界生物，研製出「伺敵於暗」的潛艇，它發射出的魚雷，可令「裹以鐵甲」的戰艦馬上「化作灰飛」。接著寫到潛艇得勝歸來，人們大事慶功。不過作者隨即筆鋒一轉，說應該摒棄這種殺人於無形的利器。最後他希望可以「埽除潛艇」，令海不揚波，表達了強烈的反戰思想：

我欲然犀來照水，照徹深淵窺見底。  
鐵網橫江鐵鎖沉，埽除潛艇永銷弭。  
寰海從此不揚波，聖人首出萬邦和。  
飄然駕我扁舟去，俯仰鳶魚嘯且歌。（63）

另有一詩寫世人擔憂彗星與地球相撞，而左秉隆卻處之泰然。詩中有聯云：「出本應期何所主，行原順軌詎相侵。」（175）可謂辭意俱佳。從這些作品可以看出，左秉隆亦像「詩界革命」的成員那樣有創新的意圖，但這類作品的數量畢竟不多。

紀遊與述懷之作，無疑是左秉隆集中更常見的題材。由於他有多次出使的經驗，故描寫域外（包括新加坡、歐美、日本）自然與人文景觀的紀遊之作頗多，北京、香港，尤其是廣州的紀遊詩亦不在少數。而他在官場和家庭生活方面的不如意，以及對時事的感慨，都使他寫出了不少牢騷滿腹的感懷之作。這類詩充滿抑塞不平之氣，但往往較為質直，以至氣魄不甚沉雄，不像前人如杜甫、蘇軾、陸游等能善於借物、借景抒懷。惟〈新置圖書萬卷有遭蟻蛀者感而賦此〉一首，是此中佳作：

插架新添萬帙綃，呼童朝暮採芸香。  
何啻惡蟻鑽新楮，更甚飢蚕食嫩桑。

<sup>39</sup> 《勤勉堂詩鈔》，頁55-56、61-62、62-63、78、81-82、112、223、254、266。

一八九四—一九二〇年代：歷史鉅變中的香港

一遍尚難容我讀，百年況欲付兒藏。  
明知破甑顧無益，檢到殘編心自傷。（115）

此詩或有借物言志的意圖。圖書可能是國家或自我生活環境的比喻，而蛀蝕圖書的「惡蟻」和「飢蚕」，則指某些不利的因素。詩人慨嘆儘管設法保護圖書，但仍然遭到蟲蟻的侵蝕，殘破的書本固然難以卒讀，要傳諸兒孫更屬奢望。雖然詩人意識到這些書本多看「無益」，但仍滿懷惋惜地去檢閱。忠厚之心，溢乎言表。左秉隆又有〈雜詠七首〉，都是諷刺時局之作，其中第三首曰：

不下堂階令自行，惟王出詔萬方驚。  
置之高閣能無罪，應以露文亦寡情。  
幾輩天良真激發，大都家國太分明。  
如何綸綺從天降，也似風吹柳絮輕。（150）

此詩感嘆清室衰微，皇權旁落，臣僚置詔令於「高閣」亦不獲罪愆，甚至以「寡情」的露布來回應。五、六句痛斥官員天良已喪，罔顧國家利益。最後再次慨嘆皇帝的詔令如風中柳絮一樣被輕視。與前一首相比，此詩無疑相當憤激，或由於積鬱過甚，不吐不快乎？可見他並非如李慶年所說那樣不關心國家大事，只是他採用的多是這種概括性的抒情話語，將自己對史事的感觀涵括其中，光看詩題並不能馬上察覺。這與黃遵憲經常使用敘事模式，並配以醒目的標題（如〈悲平壤〉、〈哀旅順〉、〈馬關紀事〉等），手法自是不同。

左秉隆的詩，大抵律勝於古，而以五絕最下。古詩每乏跌蕩搖曳之姿，而律詩往往屬對精工，佳句迭出。如「紅日滿江鼓，綠楊兩岸旗」（〈珠江競渡〉，72），聲色俱麗；「夾道高椰張似蓋，沿溪短竹剪成牆」（〈郊外晚行〉，113），寫景如畫；「宦情深夜雪，詩思早春花」（〈種瓜〉，85）與「詩情濃似花時酒，宦味冷於雪後冰」（〈憶昔〉，122-123），抽象的情思，與具象的冰雪、花酒並置，宛然在目；「人呼舊吏作新吏，我視新洲成舊洲」（〈重領新洲七律四首〉之一，168-169）、「未能搖尾終垂尾，但肯低頭即出頭」（〈書懷二首〉之一，173）與「少來愁日皆歡日，老去增年是減年」（〈新歲作〉，195），迴環往復，感慨繫之，使人嘆息不已。

被譽為「海表文宗」，果然並非浪得虛名。

### 第三節 「遷客」左秉隆的苦惱

「飄飄同梗泛，何處是蓬萊。」（76）這是左秉隆在〈渡海〉一詩中的結句，它讓人想起了杜甫〈旅夜書懷〉中的「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sup>40</sup>飄洋過海，美其名是當外交使節，卻畢竟離開了自己的母國：一種被外放的飄零感油然而生。固然，使節的社交生活有其熱鬧風光的一面，如〈夜宴柔佛王宮二首〉之一（67），寫得堂皇華麗，席散時還「滿戶擁珠輪」，一點也不寂寞。但最後卻得出了這個結論：「回首追歡會，華胥一夢空。」（前題之二，67）一切都歸於虛幻了。而實實在在揮之不去的，是私底下對親友和故土的牽念：

〈次韻和張綰良見贈四首〉之四：「亦戀君恩厚，其如母老何。秋風不須起，鄉思已先多。」（71）

本文開首引高嘉謙所言，指左秉隆的「生活憂慮，實在跟許多南來謀生者無異」。但高嘉謙只是點到即止，沒有詳細介紹左秉隆的這些詩作。以下且作若干補充。

左秉隆在詩中好幾次提到母老在堂，有病則憂，無病則喜。他辭去第一任新加坡領事及拒絕出任仰光領事，亦由於母親之故。其母姜太夫人，在他出任領事時一同前往新嘉坡居住，黃蔭普的〈記事〉嘗提及：「公蒞任奉母姜太夫板輿以行，太夫人年逾古稀，去國日久，懷鄉心切，一八八九年公駐新將九年，陳疏請終養者三，明年乃奉母還鄉。」<sup>41</sup>可以猜想，他對故土的眷念，亦是受到母親的影響。而能夠隨侍於母親之側，對他來說是人生一大堪慰之事，有詩為證：

〈壬午生日二首〉之一：「海角天涯寄此身，年年客裡度生辰。今朝一事差堪慰，躋彼萱堂拜老親。」（233）

40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三冊，頁1228-1229。

41 《勤勉堂詩鈔》，〈記事〉頁2-3。

一八九四—一九二〇年代：歷史鉅變中的香港

壬午是1882年，即左秉隆在新加坡履新的第二年。他寫於海外的作品，經常以「客」自居（如這一首和〈遲書不至〉中的「客至亞洲南盡處」，以及〈客息力作〉等<sup>42</sup>），可見外邦對他而言，並沒有家的感覺。

除了母親外，左秉隆在詩中亦提到與其他家庭成員的生離死別。他的原配夫人姓劉，於1886年病逝於新加坡領署。左秉隆在〈歎息〉一詩中，提到劉氏早已有病在身：

眼前春去又春還，歎息吾生萬事艱。  
久病妻如梅影瘦，初來妾似石頭頑。  
出門落落誰知己，對戶蒼蒼有闕山。  
我亦欲隨仙子去，燒丹採藥白雲間。（101）

衰頹的語氣，完全不像出自一個獨當一面的領事，而與一般流寓士子相近。他所謂的「吾生萬事艱」，具體從中間四句表現出來，包括染病的妻子、頑劣的侍妾、疏落的朋友、荒涼的居處。在這種處境下，左秉隆唯一想到的解決辦法，就是躲到深山修仙學道。這樣坦白地交代自己的家庭狀況，一則能喚起同情，一則亦讓人覺得他的詩確是自然流出，無矯扭之態。他為劉夫人所寫的悼亡詩〈哭內〉，亦真摯動人：

有緣結髮為夫婦，無命齊眉學孟梁。  
數載病纏身化鶴，一帆風送柩還鄉。  
慈親痛哭頭都白，稚子悲啼口尚黃。  
嗟我生平原曠達，鼓盆今媿不如莊。（107-108）

讀起來只感到他是有話便說，無意賣弄辭藻。若干年後，他隨使出訪歐美時重經新加坡，對劉夫人還是念念不忘：

〈舟過息力〉：「經過冷署頻回首，蝶去樓空樹半傾。」（  
內人卒於領署，彌留之際蝶集滿樓須臾散去）（168）。

結尾有關「蝶去」的自注，為他這段傷感的回憶平添了一抹哀艷的神話色彩。

左秉隆與其姊姊柳氏一家情誼甚篤，在新加坡時曾寄詩慰問其姊夫柳麗

42 同上，頁281、86-87。

川。<sup>43</sup>麗川亡故時，他曾寫了〈哭麗川姊倩二首〉痛悼，第一首最為悽婉動人：

家書火急遞新洲，忽報君歸白玉樓。  
不住雨從燈外灑，無窮淚向紙中流。  
生前為我多招怨，死後何人更作仇。  
最是恨難消遣處，一杯澆不到山頭。（120-121）

此詩最精警的地方，在五、六兩句，前句突出麗川「生前」對左氏的維護，後句感嘆其「死後」的撇脫與寂寞。結句寫兩地空間阻隔，表達了不能親臨祭奠的遺憾。更可哀的是，時隔五日，左秉隆又接到另外兩位親人的死訊。〈得家書知麗川介亭兩姊倩與蔭堂姻兄於五日內相繼謝世感而作此〉云：

天涯歲暮雨霏霏，兀坐蕭齋燭影微。  
萬里一書驚忽至，三人五日悵同歸。  
泉臺應喜得相伴，稚弱何堪失所依。  
極目鄉關淒欲絕，不將淚灑老萊衣。（123-124）

前人有對子曰：「舍弟江南歿，家兄塞北亡。」為了對仗工整而虛造其事，徒惹人噴飯。<sup>44</sup>而左秉隆「萬里」一聯，卻是實情，便使人嘆婉不已；「泉臺」一聯，以「喜」寓悲，則一倍增其悲痛。結句仍像前一首一樣，道出受地域所限的無奈。

不過最令左秉隆痛心不已的，還是他幾個兒子的不幸遭遇。他有六子四女，六子分別為如夫人陳氏所生的鉅、鏐、鉞、鋕，和黎氏所生的鏞、銘。<sup>45</sup>其中左鋕早卒，左秉隆寫有〈哭鋕兒二首〉（247-248）。長子左鉅生於新加坡，故另有一名曰坡生。1901年孟春，在祭掃祖墓時，左鉅不慎被火燒傷，因受驚過度，從此精神失常（見〈癩兒歌〉，48-49）。所謂禍不單行，幾年後，不幸又降臨到左秉隆的三子左鉞身上。他的〈癩兒歌〉（49-50）記載了事情的本末，開首即呼天搶天，令人神傷：

43 〈寄柳麗川姊倩〉、〈聞柳麗川病詩以慰之〉，《勤勉堂詩鈔》，頁103、238-239。

44 見胡仔纂集、廖德明校點，《苕溪漁隱叢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前集，頁377。

45 《勤勉堂詩鈔》，〈記事〉頁4。

一八九四—一九二〇年代：歷史鉅變中的香港

天既生汝身，胡又奪汝神。天既奪汝神，胡仍留汝身。人而無神生何用，譬舟無柁車無輪。受者有苦不自知，見者猶傷況其親。

接著左秉隆自述左鉞少時甚為聰敏，頗有大志，且能洞悉時態，棄科舉而學外語，又執意要到牛津大學攻讀。想不到左鉞在牛津時因用功過度，腦筋受損，不得不輟學回國，途中經過新加坡，正值左秉隆六十閏壽：

歸舟過我息力島，是我甲子重花時（六十閏壽）。  
我見汝病我亦病，何心更把葡萄卮。  
溫語相慰勸汝返，望汝家去尚能醫。  
汝曰兒去將終隱，數行淚下沾裳衣。

時維1910年，左秉隆已第二度辭去新加坡領事一職。他回鄉後，看見左鉞瘋癲的情況，傷心欲絕：

汝歸依母心鬱鬱，有時怒發驚群兒。計不獲已遂析居，家貧膏火費躊躇。及我歸來貧逾甚，仍挈汝歸住一廬。時見汝以首觸牆，穢塗滿面口還嘗。晝夜呼號如見鬼，我心匪石能無傷。嗟汝何時罪方滿，嗟我何辜罹此殃。況今天日慘無光，我欲問天天茫茫。不如我與汝同死，早離苦海歸上蒼。舉凡塵世憂患兩相忘。

「不如我與汝同死」，可謂絕望到了極點。這樣的敘事詩，在文字上不矯扭作態，只是自胸臆中噴吐而出，便已感人至深。即便是開篇「神」與「身」的重複使用，看出是經過一定的推敲，但如非發自內心，亦無法產生這樣出色的抒情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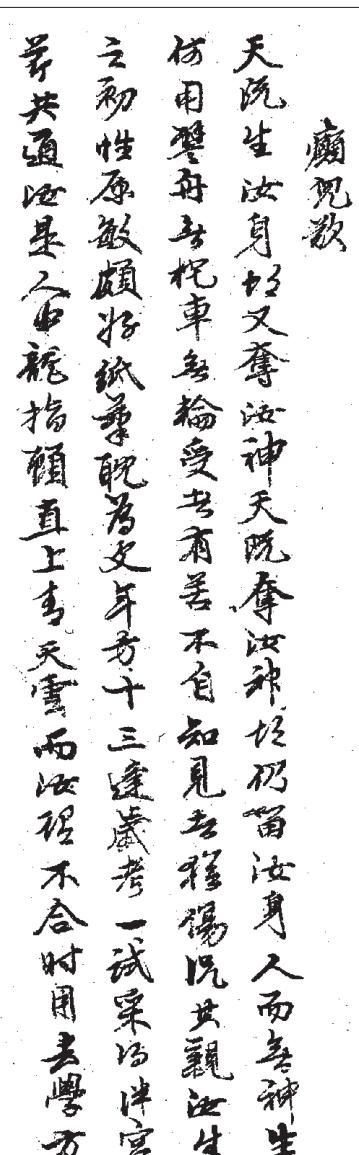
以上關於家庭不幸的陳述，讓人看出左秉隆是個篤於親情的士大夫。這種對親人的關愛，延伸開去，或許能解釋為何他在新加坡任上會竭盡己能，扶助華社的子民，急其所難，濟其所需；而他詩中常見的思鄉之情與遷客心態，亦不僅只是傳統的帝國或大中原意識在作祟，還有他自身的家庭考慮在內。

作為使節，左秉隆注定要時常被派駐海外。域外與故土空間的隔閡，人面的睽違，由此滋生了不少遺憾和有家不得歸的鬱悶。這原是自古以來無

數奔走於仕途的文人士大夫共有的悲哀，而到了左秉隆那一代的外交官，空間與飄泊的涵義大為擴闊，他們的遷調不再限於偏遠的國土之內，而是要飄洋過海，離開「聖朝」治下的疆域，遠赴名副其實的「蠻夷之地」，而且一去多年。那種茫然若失、孤立無助的現代離散經驗，是前代的士大夫鮮能體會的。高嘉謙在討論黃遵憲的南洋詩時指出：「這些詩句當然已不能看做傳統的宦遊鄉愁，而是使節清楚意識到世界版圖疆域的變化，西方勢力與華人移民共同存在的南洋現實。」<sup>46</sup>或許，左秉隆亦有同樣的意識。可以說，是時代與外交方式的改變，讓左秉隆這位天朝使節，嚐到了十九世紀末一般海外華人的辛酸。

### 結語

本文試圖從使節、詩人、遷客三個不同身份去解讀左秉隆的詩作，並從詩作去進一步闡發、引證左氏如何呈現和對待這三個身份。過去我們對左秉隆的了解，一般只停留於使節一點，以及他在新加坡任職的時期。本文較為全方位的研究取向，庶可勾勒出左秉隆更完整的人生軌跡及其作為詩人的態度。在出使歐美，和往返南洋與家國的歷程中，左秉隆透過其詩作，為我們展示了世紀末一位外交官的抱負與挫折、志趣與抑鬱。其遷徙的經驗，在某程度上，亦是新世代的華人在海外飄泊、離散的縮影。



〈癩兒歌〉在手鈔本《勤勉堂詩鈔》中的節錄

46 高嘉謙，〈論駐新使節左秉隆、黃遵憲與馬華文學〉，頁377。

在新加坡，左秉隆有「海表文宗」之譽，但僅此而已。他不但未被納入中原文學史和近代詩史的研究視線，在其揚名立萬的新加坡，亦未受到足夠的重視。原因很簡單，在新興的國族文學殿堂中，一位代表前清、具有大中原文化意識的使節詩人是無法立足的。左秉隆因此變成了在兩地都不被肯定的「無主孤魂」，像他在世時一樣。雖然新馬華文文學的研究少不免要提到他，卻把他歸類為使節詩人、或早期南來流寓的詩人之一，而非在地的本土詩人。

左秉隆的作品，誠然將「南洋主題」透過「炎荒」、「荒島」等辭彙帶入了中原視域，但實際上他在「南洋色彩」的營塑方面，既沒有下什麼功夫，亦沒有像後來新加坡本土的文人那樣有意識地去提倡。或許這是因為他對新加坡缺乏歸屬感，以及開創詩風的企圖心不大。這方面的不足，要等到黃遵憲，以及邱菽園等流寓本土的詩人才到得填補。儘管如此，他仍是新馬華文文學的先驅，當地的文學史論述中，開首的幾頁，始終不能缺了他的名字。